

#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健康事业的 开拓及其成效\*

郑士鹏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时期,党中央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推动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健全卫生防疫体系,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举措,这些探索为新时代我国发展卫生健康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实现新发展,需要坚持党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性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国际医疗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关键词]**卫生健康事业;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4)12-0063-1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

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等能力。”<sup>[1](p.37)</sup>这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卫生健康事业领域的总体部署,开启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健康中国建设的时代新篇。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卫生健康问题,自成立之日起,便将卫生健康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紧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研究”[22BDJ085]阶段性成果。

作者:郑士鹏,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系在一起,深刻回答了卫生工作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依靠谁来服务等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在缺医少药、防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提出了众多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卫生健康工作理论与政策,有力扭转了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的落后局面,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利得到保障,为我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一、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传统社会运行模式快速消解,旧中国遗留的卫生健康管理机制在应对多种卫生工作问题时十分乏力。为快速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和国家整体医疗能力,党中央将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从总体战略上对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科学规划。

#### (一)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

卫生健康是攸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更是决定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治理命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滞后,医疗水平低,卫生服务机构和技术人员尤为紧缺,新解放区内天花、霍乱、疟疾、鼠疫等烈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突出的医疗供需矛盾和较低的医疗水平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消极影响,快速发展卫生健康事业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广

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卫生防疫工作,将卫生防疫事业摆到党的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因不卫生而病死则重视不够,认为是似乎难以避免的‘天灾’。”<sup>[2](pp.27-28)</sup>这一苗头性问题迅速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sup>[3](p.395)</sup>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对卫生工作人员的领导和帮助,从而解决卫生工作人员政治性不强的问题。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sup>[4](p.205)</sup>1954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四年来卫生工作的检讨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指出:“卫生工作是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要把它管好。”<sup>[5](pp.12-13)</sup>“卫生工作对于发展生产、巩固国防、增进人民健康,极关重要,今后各级党委务必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sup>[5](p.13)</sup>在毛泽东重视和领导下,党中央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再次阐明了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改进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推动新中国卫生防疫体制机制快速建立,有效遏制了诸多烈性传染病。

#### (二)创造性确立四项卫生工作基本方针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乱不断、外患深重,烈性传染疾病横行,缺医少药危机严峻,医疗卫生与人民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致使人民体

质普遍羸弱。新中国成立使这一局面得到根本扭转。1949年10月,中央军委卫生部组织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既有经验基础上,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的“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正确做法,结合各地疫病流行情况,初步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工作人员汇集北京,共同就“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方针及“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中西医合作方向进行讨论,重点分析农村医疗、矿区医疗、少数民族医疗等问题,并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sup>[6](p.272)</sup>作为卫生健康工作三大原则。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在周恩来建议下,党中央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sup>[7](p.366)</sup>的内容,形成新中国卫生工作的科学指导方针,使紧缺的卫生资源最大限度服务于人民,有效改善了人民群众健康状况。四项卫生工作基本方针的确立极具创造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把握和遵循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研判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所确定的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为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卫生健康工作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战略导向和重要依据,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

### (三)将担当卫生防疫责任作为干部政治要求

卫生防疫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多次就卫生健康工作对全党作出重要指示,除

强调要坚持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外,更要求党的干部要为卫生工作做好服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卫生工作队伍中,少数干部存在不正确思想,例如医疗专业干部不愿参与组织工作和管理,而非医疗专业出身的干部则对卫生防疫工作多有忽视,导致卫生防疫责任难以精确划分。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多次对相关思想加以纠正,并对忽视卫生工作的干部作出严肃处理。1953年4月3日,毛泽东在批示《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时,对干部忽视卫生防疫工作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sup>[4](p.76)</sup>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强调:“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sup>[4](pp.204-205)</sup>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再次对党的干部开展卫生工作作出指示,其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对各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忽视卫生工作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提出“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sup>[8](pp.149-150)</sup>的要求。在毛泽东推动下,担当卫生防疫责任成为党对干部的一项重要政治要求。随着我们党不断加强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的卫生防疫工作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卫生防疫工作与组织生产运动、推动干部队伍建设实现有效结合,促使党的干部在取得卫生防疫斗争伟大胜利中的先锋作用得以进一步彰显。

## 二、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推动卫生 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卫生健康工作作出的科学决策,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卫生健康工作立场、重点、依靠力量及方法。通过开展社会动员,我们党将卫生健康工作与坚持走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卫生健康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全民身体素质快速提升,爱国卫生运动取得重大成就。

### (一)坚持走群众路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健康工作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是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实践认识基础上发展的,实现了从革命战争时期以军队卫生为主,到捍卫人民卫生健康为主的工作方向转变,使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宝贵经验在新中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中得到有效运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0年8月,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sup>[13](pp.182-183)]</sup>然而,在我国各级卫生部门开始在广大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卫生健康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过程中,1952年1至2月,美国为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利局面,罔顾《国际法》,在朝鲜及我国东北等地连续投掷苍蝇、蚊虫等带菌媒介物,秘

密实施大规模细菌战,对我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更使社会主义中国这一新生政权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紧急局势,1952年底,在总结一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经验的同时,政务院发布关于1953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要求继续加强一切反细菌战的措施,强调要更加普遍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清除垃圾、改善饮水、捕鼠、灭蝇、灭蚊等工作,还规定将各级防疫委员会统一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60年3月,毛泽东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中强调,“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sup>[8](p.150)]</sup>明确卫生工作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重要性,指出卫生工作“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sup>[8](p.150)]</sup>进一步在全国上下树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民卫生观,使爱国卫生运动真正转变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

### (二)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发挥群众主体能动性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形成和发展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过程中充分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通过广泛宣传和群众动员,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形成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科学方法。1952年3月,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防疫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宣传教育机关都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随着中央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卫生防疫宣传工作迈入正轨,在宣传动员人民群众、激发群众防疫热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53年后,我国各级卫生防疫站均已设立卫生宣传科(室),并积极联合社会各界发挥各自职能,广泛动员群众,挖掘群众力量。如在除“四害”运动中,北京市红十字会“培养卫生宣传员、疫情报告员、消毒员等约2.3万余人,分别组织在农村、厂矿、学校、各行业的3000多个红十字卫生站中,负责疫情报告、群众性消毒、卫生宣传等工作,成为一支重要的宣传力量。”<sup>[9]</sup>1958年,周恩来亲自部署除“四害”讲卫生突击周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和血吸虫防治科学工作者备受鼓舞,自觉行动起来加入运动热潮。同年7月1日,毛泽东欣闻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感慨道:“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sup>[10](p.382)</sup>他指出:“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sup>[10](p.382)</sup>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单位积极参与卫生工作,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下协力改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水平落后局面,使“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sup>[11](p.71)</sup>的目标成为党和人民的一致追求。

### (三)发展群众体育运动增强人民身体素质

在西方国家舆论中,旧中国人形象被描述为生活落魄、身体孱弱、精神萎靡,国家形象则被描述为卫生情况堪忧、医疗水平落后,而在体育方面,我国也一度无缘世界级体育赛事。毛泽东为此提出:“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sup>[12](p.56)</sup>新中国成立后,国民体质

羸弱,体育场馆凋敝,专业人才匮乏,在这一情况下,我国将发展体育运动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毛泽东亲自布局、过问和指导,高度重视通过群众体育运动来增强人民的身体素质,将体育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联系起来进行部署和推动。毛泽东强调:“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sup>[8](p.150)</sup>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并推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党中央统一号召下,广播体操在学校、机关、部队、厂矿、农村陆续推广开来。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sup>[13](p.563)</sup>这深刻揭示了体育运动的本质和目的,为刚刚起步的中国体育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健康工作,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改善全国医疗健康情况的战略构想,在提高医疗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培育医疗卫生人才基础上,进一步从根源上关注人民体质问题。通过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彻底甩掉中国人民“东亚病夫”的帽子,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的体育精神得到弘扬,为我国推动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促进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

## 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相较城市而言,广大农村地区卫生工作基础设施及医疗水平仍然十分

落后。为改变这一状况,党中央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建立农村卫生防疫网,积极培养“赤脚医生”,并通过合作医疗保障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了农村卫生工作快速发展。

### (一)建立农村卫生防疫网,提高农村群众健康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多分布在城镇地区,大多数农村地区面临严重的医疗资源匮乏困境。由于缺乏正规卫生医疗机构,农村群众看病吃药通常会选择地方游医甚至是巫医,一些农村群众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加之农村防疫意识淡薄,卫生习惯相对较差,疫病在广大农村地区更容易流行和传播。随着20世纪50年代全国农业合作化浪潮掀起,联合诊所应运而生,广大农村医务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医疗卫生机构。1951年9月,北京市郊区农村成立了我国首个“联合诊所”,协商一部分中医进修学校的学员和当地部分个体诊所、药铺人员参与其中。后续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乡镇卫生所或门诊部开始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批评官僚主义和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批评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老爷医院”“城市老爷卫生部”现象,并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sup>[13](p.506)</sup>根据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党委发布《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卫生防疫网建设。1965年3月,美国海军调集大批舰艇,随时准备北犯。1966年3月,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sup>[13](p.564)</sup>的口号,并担忧战时医疗卫生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会导致医务人员因不了解农村情况而无法

应对战争危机。基于此,毛泽东积极鼓励卫生医务人员到农村接受锻炼,帮助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党中央结合局势变化,进一步将农村地区卫生健康工作置于重要位置,持续加强对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组织规划,逐步形成面向农村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快速建立起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卫生网,使医疗卫生资源不断向农村地区流动,提高了农村地区预防和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和水平,使更多农村群众享有最基本的公共医药卫生服务。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的战略思考,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卫生健康事业,着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革命理想、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本色的重要途径。

### (二)培养“赤脚医生”,壮大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农村卫生防疫网初步形成。然而,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区位条件限制等,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才出现较大缺口,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的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的专业能力相对较差,技术水平不高,无法维持农村医疗机构正常运转。为此,毛泽东提出:“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sup>[13](p.506)</sup>为壮大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队伍,党中央围绕“六二六指示”加强对农村卫生防疫工作的管理,号召城市优秀医务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医疗工作,并对农村本土医疗卫生工作者进行专业培训。城市各医院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医疗专家纷纷下乡,包括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医疗专家积极深入田间地头

为农民诊治,协助培养农村本土的“赤脚医生”,推动基础医学理论培训在广大农村地区如火如荼。例如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办的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4个月,重点讲授一般医学常识及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参与培训的学员学成后,随即回到公社担任卫生员。通过培训,具有一定卫生工作经验的本土知识青年、医疗工作者在接受专业学习以后,进一步加深了对常见疾病的病理认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卫生工作人员依赖经验治病的弊端。从当时历史背景看,培养“赤脚医生”是适应和符合农村社情的科学决策,“是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对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sup>[14](p.82)</sup>也是从军事和战略的高度所提出的极富创造性的卫生健康工作战略战术和方法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才紧缺的问题,促进了城乡医疗事业均衡发展。

### (三)以合作医疗保障农村群众切身利益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依靠农民、为农民谋福利作为重要责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提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sup>[15](p.1078)</sup>新中国成立后,相较于城市中覆盖国有企业职工与国家公职人员的医疗保障体系而言,我国人口占比85%的农村地区尚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多数农民看病就医仍需要完全自费。对此,党中央积极发展合作式的医疗体系,为农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合作社对于因公负伤或者因公致病的社员要负责医治,并且酌

量给以劳动日作为补助”,<sup>[16](p.422)</sup>明确了农村合作社在卫生工作中的基本职责。为推动合作医疗制度化和体系化发展,党中央积极鼓励各地创新工作模式,合作医疗制度倡议人覃祥官等基层医务工作者和农村本土中医文化传承人积极参与行动。1966年8月,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随后山东、河南、湖南、贵州等地也纷纷探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联合保健站、联合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陆续建成。在东北地区,各省积极响应“六二六指示”号召,倡导运用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方式建设基层卫生组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问题,有效保障了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形成和实施,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四项卫生工作基本方针的科学指导思想,更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可见只有将卫生健康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才能深入群众,了解民生疾苦,才能使社会主义医疗体系更好服务于民。

## 四、健全卫生防疫体系完善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更面临多种疫病肆虐的严峻考验。为进一步遏制疫病流行,我国快速成立中央防疫领导机构,统一组织领导防疫工作,不断加大财政及人才投入,有效改善了城乡公共卫生条件,并积极推动建立应急反应制度,提高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能力,为保障人民健康、推进社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 （一）成立中央防疫领导机构统一组织领导防疫工作

疫病防控是新中国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任务,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卫生健康工作基础,党进一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央防疫领导机构,统一组织领导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察北鼠疫暴发,党中央及时成立统一指挥机构——中央卫生防疫委员会,集中卫生、公安以及铁路等多个部门力量,严密封锁交通,控制病情扩散态势,统一调配中西药资源和医疗人员第一时间救治感染者,积极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同时,卫生部门快速成立中央防疫总队,统一调度医护人员和疫苗等赶赴疫区。在中央防疫领导机构领导下,各疫区纷纷建立鼠疫防治基层组织,实现了疫病防控的网格化管理。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强调:“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sup>[17](p.372)</sup>1950年冬到1951年4月间,上海暴发天花疫情,党中央高度重视,紧急调集各种力量,组织领导各地接种疫苗,通过宣传动员、接种检查、接种登记等工作,实现了有效的疫病防治,中央防疫领导机构成为应对疫病传播的重要组织保障。1952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sup>[18](p.371)</sup>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各单位“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sup>[19](p.509)</sup>中央

防疫领导机构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破除了地域和部门的局限性,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实现了防疫信息的跨区域流动,使各区域政治资源得到整合,社会力量得到调动。在中央防疫领导机构领导下,全国上下攻坚克难,快速形成国家卫生防疫网络,防疫政策得以逐级快速落实,形成了封锁隔离、防疫救治、宣传教育一体的防疫体系,有效遏制了流行疫病,最大程度降低了疫病造成的人身损伤和经济损失,有力捍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

### （二）加大财政及人才投入改善城乡公共卫生条件

旧中国卫生事业十分落后,新中国卫生健康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卫生资源紧缺、公共基础薄弱的艰难境地。新中国成立之际,国家大部分力量集中在维护新生政权、改变百废待兴的局面,迫切需要恢复国民经济,军费开支和经济建设开支占据了大部分财政开支,卫生健康工作面临较大资金缺口。1950年8月,周恩来提出:“希望在三五年内使每一个县都有医院,每一个区都有卫生所。”<sup>[20](p.26)</sup>1951年9月,毛泽东在综合考量卫生工作经费问题时提出:“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sup>[21](p.122)</sup>“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sup>[21](p.122)</sup>为更好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快速建立卫生战线和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党中央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在有限的经济基础上大力发展医疗事业,逐渐把以区域防疫为核心的卫生健康工作转移到全国性卫生健康工作上来。1952年4月9

日,毛泽东在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拨款500亿元改善北京市卫生环境。在中央财政大力支持下,劳保和公费医疗制度在全国各地逐步实行起来,卫生部先后颁布了《关于组织联合医疗机构实施办法》《县卫生院暂行组织通则》《县属区卫生所暂行组织通则》等办法规定。全国医院、疗养院床位、儿童医院以及妇产医院、妇幼保健院数量不断增加,推动了新中国基层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涵盖全国县、乡、村的医疗卫生网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创造了良好的公共卫生条件。

### (三)推动建立应急反应制度提高危机事件应对能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地公共卫生突发危机事件频发,对党领导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提出严峻考验。在疫病急速传播的情势下,党中央总结解放战争期间各种疫病防治工作的有效经验,全力推动建立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应急反应制度,并对疫情报告体系进一步优化。1950年伊始,卫生部先后发布《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种痘暂行办法》《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管理麻风应行注意事项的通报》《交通检疫暂行办法》等制度规定,对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作出科学部署。1952年春,流行性感、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疾病威胁着华北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完全消灭现有疫病。”<sup>[3](p.521)</sup>为提高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应对能力,1955年国务院批准颁发《传染病管理办法》,对各类急慢性传染病进行依法处置。《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进一步提出:“从一

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sup>[22](p.651)</sup>党中央和各个部门先后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关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应急反应机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制开始向着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了各类传染病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和扩散,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

##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健康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性价值取向、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健全卫生防疫体系等,为新时代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

### (一)坚持党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全面领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持续加强对卫生健康事业的领导,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卫生健康工作摆到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将维护人民健康视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只有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才能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才能确保卫生健康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进。基于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推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一是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

领导。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发展卫生健康事业,要将讲政治置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首位,牢固树立“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sup>[23](p.39)</sup>的理念,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辩证协调和把握卫生健康工作的民生属性和政治属性,确保全社会步调一致、同频共振。二是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组织要将卫生健康工作纳入工作目标和考核体系,综合采用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等手段,加强对卫生健康工作全链条的监管。通过细化工作措施、优化配套政策、加强多方协作等方式,增强党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领导,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三是围绕卫生健康工作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政治要求。将参与和组织卫生健康工作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要求,调动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卫生健康工作的热情。增强党员干部自觉担当的责任意识,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素养和政治品质,从而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 (二)坚持人民性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

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改变历史命运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宣传动员,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协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充分激发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民

力量在改善新中国落后医疗条件、提高卫生健康水平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在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过程中,一是坚持人民性价值取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更加健全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23](p.164)</sup>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破解医改难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以“降药价”为切入点,促进缓解人民群众“看病贵”的难题,推动中西医结合诊疗和高值医用耗材研发实现新突破。二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加强对卫生健康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解决周期性、总量性、结构性问题,加大体育类、健康类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引导人民群众增强卫生健康意识和医疗监督意识,积极参与全民健身类社会体育运动。与此同时,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促进增强人民体质,使人民群众成为国民健康的捍卫者和促进者。三是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区医疗共建。推动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鼓励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社区疾病预防、诊断、治疗、营养、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进程中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使人民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医,在生活半径内就好医。

### (三)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快速提高卫生健康工作水平,党中央将卫生健康事业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全力建设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夯实基层公共卫生

保障,建立起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机制,并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赋予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社情和民情的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颁布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构建更高层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制度文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又一具体的实现路径。习近平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sup>[24](p.81)</sup>《决定》针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新时代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化,一是从战略上着力优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格局。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sup>[25](p.99)</sup>为进一步缩小公共卫生服务的城乡差距,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sup>[1](p.37)</sup>通过对卫生健康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促进疾病治疗、干预手段、数字疗法、数字健康等技术的迭代升级。创新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二是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筑牢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加大全科生培养培训力度,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使用激励机制。进一步健全以疾控单位和各类专科疾病

防治机构为核心、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保障的多元协同疾控体系,以建立紧密型医共体为着力点,加强协同服务和统一管理。三是建立健全智慧型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智慧预警体系。加快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传染病防治体系,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中的应用。逐步实现监测数据的智慧采集、处理、分析和预警,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流行病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 (四)深化国际医疗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于其蕴含的独特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核,纵观五千余年民族历史,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特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医疗援助与合作,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维护人类卫生健康的角度具象化地彰显出中华民族“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开放理念。1963年4月6日,我国首支援外医疗队秉持“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理念,从北京出发,抵达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赛伊达,为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送去医疗援助。这不仅打开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医疗合作的新局面,也为我国后续60余年的国际医疗往来奠定了重要基础。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中指出:“加强国际合作。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sup>[26]</sup>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合作。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决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

化、污名化的企图。”<sup>[27]</sup>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态度。基于此,应进一步深化国际医疗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增进世界人民健康福祉。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卫生健康国际组织和区域的合作机制建设,促进全球及区域卫生健康事业的有序发展。二是加强对外医疗援助,搭建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医疗桥梁”。采取派遣专家组、临床带教、学术交流以及远程指导等多种形式,协助培养当地医疗队伍,协助受援国建立重点专科中心,使其更好发展卫生健康事业。三是持续发挥传统医药的独特作用,推动中医文化走向世界。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命题加强国际医疗合作研究,建立中西医结合的新型诊疗标准和疾病评价指标。在对外医疗援助的过程中,向世界讲好中医药文化,让中医诊疗融入当地人民生活,使中华医药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国家间民心相通、传递友好情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李自典.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N].学习时报,2023-02-17.
-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8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1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8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14]宋学勤,李晋珩.新中国成立17年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研究[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1).
-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2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6]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N].光明日报,2020-05-19(01).
- [27]习近平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光明日报,2021-05-22.

责任编辑:维 恩

**The Firm Cohesion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rratives of the Growth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 are gradually constructed in dynamic changes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policy implementation, educational path, and social network.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policies, ethnic minority cadres' career choices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are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social structures and national policies, thus gradually constructing and deep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e can further recognize how key events in the growth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 became turning points in their identity. These turning points not only affected their career trajectories, but also prompted them to deepen their loyalty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country in their daily work. Family ties and occupational 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 helping them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lives internalize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uppor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to implement policie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u Yue-zhuo, He Da-wei)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 practice of healthcare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mark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garded public health,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general medical work as a major political task, extensively carrying out social mobilization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mass movement, focusi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work on rural areas, and improving healthcare system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mergency measures for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These explorations have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healthcare servic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healthcare service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PC's overall leadership i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ystem, uphold the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people as the main force,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public health to promote the soundness of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deepen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operation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ealth care for mankind. (Zheng Shi-peng)

**The CPC's Leadership in Improving Civic Morality in Rural Area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Improving civic moralit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CPC's rural construction.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have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normative qualities of morality, small peasant mental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peasant mentality by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provid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he CPC's improving civic morality in rural area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mproving civic morality in rural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s gone through the arduous exploration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since the new era. In the face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CPC has constantly pushed forward new achievements and breakthroughs in improving rural civic morality, through closely combining the specific realities and developmental needs in rural areas and constantly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Zhang Zhi-tao)

**The Limited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the centuries-long history of market economy,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disput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varies, along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market should be properly utilized since its natural advantage in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s conducive to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of productiv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arket such as blindness, spontaneity, and especially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logic are gradually reveal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market, but do not fully advocate the free market. From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the main economic schools in the West do not completely agree with the fre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ir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from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did not completely let the market go uncheck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has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active use of government power.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Yan Juan)

(翻译:张剑锋)